

实证翻译研究的发展及趋势

黄立波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20世纪80年代,实验心理学方法开始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开启了实证翻译研究新篇章。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方法用于翻译过程探索,实证翻译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使实证翻译研究扩展到翻译产品和功能领域,实证翻译研究方法论初步建立。本文在综述其发展基础上指出,此类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描写的本质、量化的分析及透明的研究方法。近年,实证翻译研究表现出如下趋势:第一,对原有研究领域及课题的重新审视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多样化思路;第二,研究方法综合程度不断提高,催生出更多新研究领域;第三,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促使翻译学从描写和解释开始向预测过渡;第四,多元化数据交叉验证使数据阐释成为关键;第五,不断提高的跨学科性呼唤跨学科团队。

关键词:实证研究;翻译过程;语料库翻译学;跨学科

Development and New Trend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HUANG Libo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S). In the 1990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thodologies from computer technology, cognitive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gave a new momentum to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ETS). Meanwhile, the emergence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CTS) further extend ETS to the product - and function-oriented researches, which makes TS complete in terms of object of study as an empirical discipline. The methodology for ETS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S, the present paper identifies three features which characterize ETS, namely, descriptive research in nature,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ransparent methodology. ETS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new trends; firstly,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present field and topics available has provided diversified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secondly, the integr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have yielded more new research areas; thirdly, increasingly improved computer-assisted technology is making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S, i. e. to describe, to interpret and to predict, turn into reality; fourthly, the triangul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 makes sense-making of data the core of research; lastly,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the field dema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s.

Key words: empirical studies; translation proces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ity

1. 引言

根据 OED, 英语“empirical”一词最早出现在 16 世纪,源于拉丁语 *empiricus*,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个医学流派,该流派认为治疗应建立在观察和经验基础上。后来,empiricism(经验主义)发展

为一种哲学思想,与 rationalism(理性主义)相对,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检验假说。以此哲学思想为依据的实证研究指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依靠直接观察或实验来获取新知识的研究类型,关注对可体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和解释,用于回答研究问题、检验及提出理论或假设(Tavakoli 2012:189)。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产生了实证翻译研究这一分支。Holmes(1987[1972]:15)指出,翻译学本质上属实证学科,并提出翻译学研究的两个主要目标:“(1)描写我们经验世界中关于翻译过程及产品本身的各种现象;(2)建立一般原则并用于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由此可见,实证翻译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思想不同于以往以产品为研究对象、以源文本为衡量标准、以回溯式评价为主要方式、以规定和演绎为主要方法的传统翻译思想。80年代初,实验心理学方法被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取得了一定突破。9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方法逐步应用于翻译过程探索,进一步推动实证翻译研究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语料库翻译学兴起使实证翻译研究拓展到翻译产品和功能领域。本文拟在梳理实证翻译研究发展历程基础上,归纳其特点,结合近年该领域的新成果讨论其发展趋势。

2. 实证翻译研究发展历程

2.1 实证翻译研究发端——描写翻译学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Holmes(1987[1972]:15-16)提出翻译学属实证学科,并明确指出描写翻译学(DTS)分支与实证研究关系更密切,可分为产品、功能和过程三类取向(见表-1)。

表1 描写翻译学的三个分支(Holmes 1987[1972])

	产品取向	功能取向	过程取向
研究对象	现有翻译作品,可以是单个文本,也可是文本整体	翻译文本在接受语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功能	翻译行为本身,即译者头脑中的“黑匣子”
关注焦点	文本	语境	转换
研究途径	A. 单个译作描写; B. 同一源文本多个译本对比分析; C. 翻译文本库整体描写	特定时间、特定地方何种文本被(未)翻译? 产生了何种影响?	对此有一定理论探讨,但实验条件下系统考察尚未开展。
研究视角	特定时期/语言/文本类型; 共时/历时	翻译史/文学史	心理学
学科发展趋势	翻译通史	翻译社会学/社会翻译学	翻译心理学/心理翻译学

根据 Holmes(1987[1972]),直到当时,产品取向的描写翻译研究依然是主流,功能取向的描写翻译研究鲜有关注,过程取向的描写翻译研究尚未开展。即便对产品的描写研究是主流,也仅限于传统对单个译作的文本描写和分析,以及一文多译对比分析。Holmes指出,翻译学属实证学科,翻译学描写分支与实证研究最接近,但当时实证研究在翻译研究中尚未正式开展。值得关注的是,Holmes已提出对较大规模翻译文本库考察的设想,并指出这样的翻译文本库可以是特定时期、特定语言、特定文本或话语类型的文本库,可是共时库或历时库。可见,语料库翻译学思想雏形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产生。

从实证翻译研究发展视角看,70年代是实证翻译研究思想的开端,但围绕产品、功能与过程的实证研究尚未开展。尽管有观点认为实证性研究在翻译学领域一直存在,如翻译批评与误译分析,但本质上这类研究属于产品取向而非过程取向的实证研究(Kusssmaul & Tirkkonen-Condit 1995:

177),是广义实证研究,而非严格意义的实证研究。

2.2 实证翻译研究的突破——翻译过程研究

Neunzig(2011:15)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翻译学开始采纳形式主义乃至自然与社会科学思想,并借用其方法论及工具,其理由是:理论原则在解释特定领域可观察现象时无论多充分,只有具备可操作性,才具有科学和认识价值,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实验研究的系统观察和充分检验才行。这一思想观念转变为实证翻译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翻译研究者也认识到,规定和演绎方法在翻译学领域一直占主导地位,必须开发实证和归纳方法才能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Kussmaul & Tirkkonen-Conditt 1995:177),实证翻译研究的突破首先出现在过程取向的描写翻译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有声思维报告(Think-Aloud Protocol, TAP)开始作为采集内省数据的手段被用于探讨翻译。到目前为止,翻译过程考察总体上经历了以实验心理学方法、计算机辅助技术和神经科学方法为基础的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存在时间和方法论的部分交叉与重合,以下分别作扼要回顾。

2.2.1 实验心理学方法——内省法、有声思维法、口头报告

内省法作为系统的自我观察法由德国实验心理学创始人 Wilhelm Wundt 最早采用,他用内省法考察反应时间、词语联想、注意力、判断力和情感等问题,但不用于思维、记忆或认知等高级心理活动,他将内省法定义为“直接体验”(参见 Börsch 1986:196)。之后,内省法被其他一些心理学家运用于思维研究。有声思维法与内省法不同,有声思维实验中受试者仅被要求说出思维过程步骤,据此观察他们的思维行为而非思维内容(同上:198)。也就是说,受试者将思维以口头形式自然表达出来,不受控制、引导或观测。口头报告(verbal report/protocol)是另一种采集内省数据的方法,是受试者对自己处理问题时思考任务的表述,作为一种任务类型,口头报告可以是有声思维报告,也可是对访谈问题的回答,亦可是受试者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回顾性解释(Ericsson et al. 2006:176)。研究者通常将借助以上方式采集的数据统称为口头数据。

尽管对 TAP 方法既有支持也有反对,到新世纪初,此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述要和翻译方式考察等四方面(参见李德超 2005)。TAP 方法用于翻译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作用:提升描写和解释翻译过程的可能性,从而提升我们的理论认识;实验中观察到的有效翻译策略可应用于译员培训,对学生译员翻译过程的观察分析可作为翻译教学法基础,有助于翻译教学发展(参见 Kussmaul & Tirkkonen-Conditt 1995:178)。有声思维报告可分为独白型报告、对话型报告和小组报告等类型,第一类较常见,后两类是由两人或多人参与的讨论型思维报告。根据 House(1988),对话型报告提供的数据要比独白型报告更丰富(同上:180)。实际上,尽管讨论型思维报告数据更丰富,但也会纳入一些额外信息,影响实验结果。

TAP 方法用于翻译过程研究改变了以翻译产品为中心的传统研究模式,转向以译者为中心。方法上,主要以实验心理学方法论为基础,采用实证归纳方式,通过采集相关数据考察翻译过程,避免主观判断。但研究手段并不等于研究结果或发现,我们必须明白研究目标是什么,即如何有效筛选、归纳、分析和解释各类数据,从不同角度认识翻译过程。

2.2.2 计算机辅助技术——键盘日志、屏幕录制、眼动追踪

除 TAP 数据外,一些计算机软件也可记录译者的翻译过程,采集相关数据,作为翻译过程研究的辅助。键盘日志(keystroke logging)是借助 Translog、PROXY、Inputlog 等软件监控并记录翻译行为,且不对翻译过程造成干扰。软件提供的翻译过程数据包括:光标移动、更改和更正、准备、草拟及修订位置及时长、停顿位置及时长等,此类数据可以日志文件形式存储,在统计基础上分类、附码,加以解释,此外重播功能还可将整个书写过程呈现在屏幕上,作为内省法的有效补充(Hansen

2013:91)。Translog 是一款专门用于获取翻译过程数据的软件,1995 年由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开发,Hansen(2002)即是以此软件为基础,辅以有声思维法及回顾报告等传统内省法探索翻译过程的成果。2009 年,Translog 开发了眼动追踪界面,连接眼动追踪设备便可同时记录译者所有视觉运动。2012 年推出的 Translog II 可记录所有用户活动数据(user activity data,UAD),包括敲击键盘和目光运动轨迹,并能将数据分为插入、删除、光标移动、复制/剪切-粘贴、回车、鼠标操作、注视点、注视集、注视集与屏幕字符匹配等类型,准确记录每次操作的时间且干扰翻译或书写过程(Carl 2012:4108)。研究者可根据 Translog 提供的数据进行与翻译过程相关的各类研究。

屏幕录制(screenshot recording)软件可将译者完成一项翻译任务时的计算机操作全程从屏幕上完全捕捉下来,包括计算机辅助工具使用、利用在线资源检索信息、目标文本生成、修改、停顿等,并以视频格式存贮下来,以备回顾型分析使用(参见 Angelone 2015:111)。

眼动研究早期主要关注眼动在阅读中的作用,眼动追踪(eye tracking)技术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主要关注译者在源文本与目标文本间的注视时长(fixation duration)、扫视距离(saccade length)、回视次数(number of regression)等^①。眼动追踪仪可按顺序捕捉译员在翻译过程中落在计算机屏幕上的目光,并标出时长,通过分析译员扫视及注视模式,及其在源文本与目标文本间的分布规律,记录切分倾向、翻译单位、理解、转换、译文产出及使用翻译辅助工具等翻译过程因素(同上:112)。眼动数据还能以可视化形式呈现,借助软件做进一步分析。此外,还有研究通过记录瞳孔扩张,考察翻译过程涉及的认知活动(如 Hyönä, Tommola & Alaja 1995 等)。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翻译步骤及转换、特定语言项认知加工、翻译次能力、不同形式翻译任务认知加工及机辅翻译过程研究等(参见王娟 2016)。通常用于考察翻译过程各类计算机辅助软件需要与一些相关方法结合,如眼动仪研究会与键盘日志、屏幕录制结合,计算机辅助软件会和内省法结合使用。

2.2.3 神经科学方法——PET、fMRI、ERPs 等^②

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神经科学一些研究方法开始被用于语言使用过程考察,主要关注特定语言使用过程与大脑神经活动间的关系。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是一种核医学检查成像技术,它能利用大脑扫描仪伽玛探测射线测量血流、代谢和神经递质结合与摄取,某一区域神经元活动频率提高时,区域氧消耗及血流会相应增加,因此可通过在血流中注入示踪剂,监控不同神经元的活动过程(参见 García, Mikulan & Ibáñez 2016:24)。PET 技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被应用于翻译过程讨论,Klein et al.(1995)以母语为英语且精通法语的双语者对押韵词、同义词和翻译对等词三类生成任务入手,考察词汇语音和语义生成是否会激活相同区域,以及二语和一语机能是否依赖相同的神经基,研究发现:同一语言内和跨语言词汇处理依赖的神经基相同,研究结果也不支持语言学习者后天所学语言与其母语的呈现方式有差异这一假设;Price et al.(1999)考察了德语-英语高级双语者的词汇翻译与阅读,PET 研究发现翻译活动在双侧基底神经节结构、左前岛、小脑、辅助运动皮质的激活要比阅读活动高,翻译活动中对不同语言的反应被激活后,阅读反应就会受到抑制;Rinne et al.(2000)考察了芬兰语-英语职业译员的同声传译和影子练习(shadowing),译入母语的同声传译会诱发更多左额激活,译向外语的同声传译会诱发更多左侧额颞激活,PET 研究结果表明,同声传译激活的主要是大脑左半球结构,此部分通常与词汇检索、语义加工和言语工作记忆相联系;翻译方向对大脑激活模式有明显调节

^① 注视通常持续 200-250ms,扫视距离通常为 8 个字母,通常阅读难度较大文本时,注视时长增加,扫视距离缩短,回视频率会增加(Raney & Rayner 1993: 283-284)。

^② 本节综述性内容部分参见 García, Mikulan & Ibáñez(2016)。

作用,译入外语要比译入母语需要更多大脑激活。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是一种神经影像学技术,其原理是利用磁共振造影测量神经元活动引发的血流变化。特定区域血流变化会带来磁共振信号的细微变化,称为血氧水平依赖效应。通过对比目标任务过程中控制和基线条件下的血液动力学浓度,研究者就能推断出哪个区域在哪项任务中被运用。Lehtonen et al. (2005)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方法考察了源语与目标语单位句法差异是否对神经活动起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翻译活动会诱发相似的前额叶皮层和苍白球激活,表明正向翻译中句法复杂程度不会对大脑控制机能起调节作用。Hervais-Adelman et al. (2015)考察了同声传译与复述及听力的神经基础发现:同传和复述在语言感知和产出以及一般领域认知控制方面表现出几处相同区域,这些区域构成了一个包括颞区、额下皮层区、顶叶下部及苍白球和丘脑等皮层下结构的对称网络,而同声传译专用网络包括额下皮层区、运动神经及基底核结构,承担语义加工、多语和一般认知控制、语言准备和注意技巧。fMRI 研究证据表明,翻译与传译中控制过程与执行控制的神经区域相重合。

脑电现象早在 1875 由英国生理学家 Richard Caton 发现,20 世纪 20 年代被正式记录并有论文发表,但直到 30 年代才得到广泛认可(魏景汉、罗跃嘉 2010:1)。脑电图(EEG)是通过脑电图描记仪记录大脑皮层产生的微弱脑电位(brain electric potentials)并放大记录的曲线图。自然状态产生的电位称为自发电位,特定刺激条件下的脑电位称为诱发电位。60 年代,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开始发展,属诱发电位,用于评估大脑功能、大脑行为关系、心理状态、药物反应,其最大优势在于无创伤性,ERPs 为观察从初始刺激介入到最终显性反应(或信息存储)的神经过程提供了一个观测窗口,此前一些仅靠推理考察的人类行为过程,可借助 ERPs 方法直接验证(参见 Callaway, Tueting & Koslow 1978: xiii)。Janyan、Popivanov 和 Andonova(2008)考察了从外语(英语)向母语(保加利亚语)抽象与非抽象同源词 lamp vs. method 与非同源词 elephant vs. freedom 的翻译,研究表明:尽管对同源词的语义激活要晚于非同源词,大脑对同源词的处理不仅仅在词汇层面,还涉及语义层面;大脑活动模式表明,对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处理在时间与空间分布和语义层面上有分别;对二语非同源词的加工过程与对具有相同特征的一语词语加工相似。

基于头皮脑电图的功能关联(Functional connectivity through scalp electroencephalography)研究主要考察思维活动中大脑不同区域的相互作用。大脑不同部分的协调活动会创造出一个功能网络,对这一功能网络的考察可从结构关联、效果关联和功能关联三个视角进行。此外,近些年直接电刺激(Direct electrostimulation)、颅内记录(Intracranial recordings)等一些微创方法也开始被用于翻译过程考察,如 Borius et al. (2012)等。

García, Mikulan & Ibáñez(2016:40)指出,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有这样一些优势:(1)空间高分辨率研究可为翻译研究带来一些启示;(2)时间高分辨率技术可为我们认识语际重组提供一些关键信息;(3)神经科学方法可揭示一些行为任务所无法捕捉到的隐藏效果;(4)神经科学研究证据还可揭示译者大脑现有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尽管如此,García, Mikulan 和 Ibáñez(同上)指出,也不能夸大神经科学方法对翻译研究的优势,恰当的做法是将神经科学方法作为其它方法的补充。Tymoczko(2012)指出,翻译学已从语言学、文本分析、翻译政治、认知科学等诸多方面探究翻译过程和产品,但对翻译产出与接受从个体大脑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认识还知之甚少;这一未知领域的大部分问题将在未来二十五年借助神经科学得到揭示,关于翻译语言处理方面将会在未来十年产生重大发现,从而将宏观层面可观察行为与人脑神经元及神经元通路微观层面在翻译产出与接受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

学科交叉促进了翻译学的跨学科性,也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翻译的跨学科性

不仅体现在翻译学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而更应体现在翻译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惠”关系(García, Mikulan & Ibáñez 2016:42)。也就是说,从神经科学视角探究翻译,不仅是借助科学方法研究翻译现象,更是通过研究翻译来认识人类自身。

2.3 实证翻译研究的拓展——语料库翻译学

2.3.1 语料库与实证翻译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Baker(1993)提出用语料库方法来研究翻译的途径,开辟了翻译实证研究的新阶段。翻译文本整体被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同一语言中翻译语言整体相对于非翻译语言或源语言整体表现出的一些诸如简化、显化、范化、整齐化、独特项欠缺再现等特征被作为翻译共性假设,借助语料库手段,在各语对之间进行检验;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方法(Baker 2000)使得对不同译者的个性化、规律性语言使用模式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语料库方法的运用可帮助研究者观察到之前通过人工方式无法察觉的语言使用特征;大规模历时语料库的构建,使对目标语语言历时变化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语料库翻译学(CTS)的发展使翻译实证研究不再仅局限于翻译过程,也拓展到了产品和功能领域。

语料库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突出体现在语料库口译研究(CIS)领域。Setton(2011:35)指出,口译研究更多涉及认知和心理语言过程,语料库口译研究从方法上可分为描写型和实验型两种:描写型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特定专业技能,应用于口译培训;心理语言学范式下的实验型研究则可更多揭示口译的语言心理过程。口译语料库通常是将翻译过程的音频转写为文字文本建库,转写除文字本身,还包括对口译员停顿、口误等副语言特征的标注。随着文本、音频、视频相结合的多模态口译语料库的出现,“语料”概念进一步扩大,标注范围随之扩大,不再限于词类或句法,还包括说话者或口译员的手势、节奏、音量、韵律、现场环境因素等真实情境下的各类语言或准语言特征。从而将产品实证研究与过程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达到对口译的全程分析。

2.3.2 语言“大数据”视域

翻译研究领域的“大数据”从来源方式可分为文本数据(textual data)、多模态数据(multimodal data)和实验/诱导数据(experimental/elicited data)三种。文本数据指来源于电子化可机读语料库的数据,语料库文本可以是翻译文本本身,也可能是与翻译相关的各类翻译话语文本,如译者前言、后记、翻译评论或翻译批评、译者访谈等。前者可用于一般语际对比或语内类比研究,后者可作为解释研究结果的理据资源库。多模态数据是来源于音频、视频等其它形态文本的数据,借助音频或视频工具转写及标注录音或录像文件,在此基础上可批量提取相关数据。目前,翻译学领域基于多模态数据的研究主要应用在口译研究领域。实验/诱导数据是指借助内省法、TAPs、口头报告等实验方式,和计算机辅助记录或追踪软件记录的译员翻译行为过程数据,及依靠认知和神经科学手段获得的大脑生理活动数据。三类数据共同构成实证翻译研究“大数据”。

这些“大数据”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不仅采集各类文本数据,对译者的翻译行为特征进行推理性描写,而且还集中关注译者外在翻译行为过程和内在大脑活动,由此探究翻译转换过程与结果的相关性,将文本与非文本因素、外在行为与内在生理结合,真正达到对翻译现象的全面描写、解释甚至预测。

3. 实证翻译研究的内容与特征

纵观实证翻译研究发展,可以说其经历了从实证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到基于语料库的实证描写研究模式,再到一个与前两者相结合,全面关注翻译过程、产品和功能及三者间相关性的综合方法论。尽管有待进一步完善,实证翻译研究的范围已初步明确,方法论已初步建

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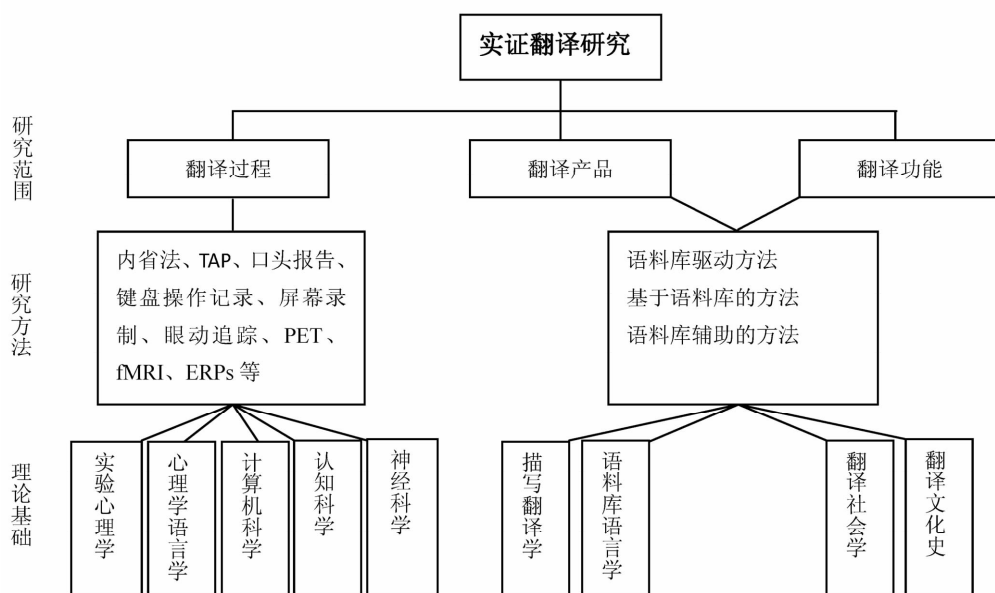


图 - 1 实证翻译研究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如图 - 1 所示,现有实证翻译研究主要涉及过程、产品和功能三个方面,其中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已有近四十年历史,研究基础较好,方法论体系比较丰富。对产品和功能的实证研究主要以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论为基础,其中对翻译功能的关注除语料库手段外,还涉及翻译社会学和翻译文化史研究。对实证翻译研究的发展,国内学者也做了一些总结和讨论(如姜秋霞、杨平 2005;李德超 2005;苗菊 2006;苗菊、刘艳春 2010;曹佩升、刘绍龙 2011;邓志辉 2012;王少爽 2012 等),现阶段实证翻译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建立在与翻译现象相关的观察或实验数据基础上的描写研究。翻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通常都是对一定范围内、真实存在的翻译现象或行为样本进行观察和描写,可以是某类文本整体,也可是个案,还可是动态过程,通常尽可能少地人工干预研究过程,采取归纳分析方法,得出总体规律性(参见姜秋霞、杨平 2005:23 - 24),并且避免对结果做“孰优孰劣”式的价值判断。内省法、有声思维法、神经科学方法等对翻译过程的关注即属于动态描写研究,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翻译产品,包括某类文本整体或个案。

第二,量化数据多元化,量化分析综合化,定性分析理据性增强。实证翻译研究数据从性质上可分为自然数据和诱导数据,自然数据如语料库提供的语言数据,诱导数据指通过实验过程获取的数据。自然数据与诱导数据的结合运用也是实证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目前研究数据不仅来源于翻译产品性质的文本数据,还有借助计算机软件工具采集的音频、视频等电子数据,以及通过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法采集的实验数据,多类型、专业化语料与数据的结合必定会将翻译学带入一个崭新阶段。研究方法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频次统计和对比分析,而是采取统计学中的多因素或多变量分析法,从多个视角立体考察翻译现象。

第三,研究方法的透明性。实证翻译研究方法具有可重复性,即一项实验研究设计可在类似实验中复制,且研究结果之间必然有一定相关性。无论实验心理学方法还是计算机辅助方法,无论语料库方法还是神经科学研究方法,都统一于实证翻译研究方法上的透明性。从每一项研究我

们都能清楚看到提出假设、界定变量、界定受试或研究对象、确定实证研究类型、采集并分析数据、讨论并解释数据等实证研究的每一个步骤(参见 Neunzig 2011:35),这种透明性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性。

4. 实证翻译研究新趋势

近年,国外出版了一系列讨论实证翻译研究的论著,如 *Exploratory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2013)、*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Explored*(2016)、*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2016)、*Corpus Methodologies Explained: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2017)、*Text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2017)、*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2017)^③等。从这些成果不仅可看到实证翻译研究的成绩,还可发现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一,对原有研究领域及课题的重新审视,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多样化思路。90年代之前的实证翻译研究就是指借助观察或实验方法对翻译过程的考察,通过数据推理译者大脑中的翻译活动。90年代起,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论使实证翻译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Sutter、Lefer 和 Delaere(2017:2)认为,语料库翻译学是实证性的,通过吸纳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方法作为有效补充,最终会发展成为实证翻译学,各种研究方法与模式互补,最终将形成更充分和完善的实证翻译理论。以翻译共性研究为例,Sutter、Lefer 和 Delaere 认为,共性特征不仅可归因于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之间的差异,还会受其它一些诸如文本类型、源语言、译者教育背景等语言外因素制约,因此翻译文本中的语言行为是一个多因素现象,而目前对译者语言行为的多因素考察还比较缺乏。Sutter、Lefer 和 Delaere 呼吁:语料库翻译学亟需多维尺度、层级聚类分析、混合效应模型等一些多变量分析统计方法,以便弄清楚哪些语言外因素在同时影响翻译中的语言行为,最终目标是解释翻译文本中各类语言选择的社会、认知原因及动机。

第二,研究方法综合性不断提高,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催生出更多新研究领域。Ji(2013)将主成分分析、层级聚类分析等探索性统计分析应用于文学翻译文本的量化考察,研究表明探索性统计方法可有效发现不同语料库间的相关性,此类方法可广泛运用于实证翻译研究。Ji(2016:1)又指出,实证翻译研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在于语料库方法与应用语言学及文学研究中一些成熟研究手法的综合运用,这样的结合催生出一些如语料库翻译文体学、计量翻译学、实证多模态翻译研究等实证翻译学新领域,其共同特征在于突出的跨学科性、探索性和实验性。Laviosa et al. (2016: vii-viii)指出,以基于语料库、语料库辅助和语料库驱动方法综合运用为基础的实证翻译研究的一个优势,就是通过对语料库数据的采集、定量处理和定性分析,将基于语料库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文化语境分析有机结合,相邻领域的定量与定性分析互补,促进翻译学真正成为一门实证学科。

第三,不断更新的技术辅助手段不仅促进了对现象的科学描写和解释,并开始向预测过渡。根据 Carl、Bangalore 和 Schaeffer(2016:4-5),新技术支持促成了翻译研究超越描写,达到对翻译现象的解释与预测这一目标。如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翻译与翻译技术研究与创新中心(CRITT)开发的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Database, TPR-DB)是一个依靠 Translog 工具采集的超过 500 小时的翻译过程数据库,并带有 200 种标注。基于这一数据库的最新成果(Carl,

^③ 该论文集大部分论文曾作为 2013 年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Split)召开的欧洲语言学协会第 46 届会议上“语料库翻译学中翻译行为分析新方法”工作坊的发言。

Bangalore & Schaeffer 2016) 从计算语言学、统计学和心理语言学三种研究模式展示了新技术工具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有效性。

第四, 语料类型和数据来源多样化, 数据间构成交叉验证, 数据阐释成为关键。语料类型不断丰富, 对原有假设提出了挑战, 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Ferraresi & Miličević (2017) 建立了一个由书面翻译文本与同声传译文本构成的跨模态翻译语料库——欧洲议会口笔译语料库 (EPTIC), 具体包括欧洲议会演讲、演讲同声传译、会议议程文字整理稿、整理稿书面翻译稿四类语料, 并借助意大利语子库, 从固定用语 (phraseology) 入手考察书面语译文和口译的差异, 研究表明: 书面语译文比口译在固定用语使用方面更倾向于范化。以此为思路, 此类语料库还可扩展到视译、交替传译、旁白 (voice-over)、字幕翻译、配音翻译等模态。Čulo、Hansen-Schirra 和 Nitzke (2017) 建立了一个由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编辑修订三类文本构成的语料库, 主要关注英语说明书和病人须知不同意大利语译文的术语处理, 研究表明: 编辑修订文本很大程度上受先前机器翻译文本影响, 编辑修订文本过程中更倾向于关注微观问题, 而忽略宏观上术语的逻辑一致性。实证翻译研究不仅注重量化统计与分析, 更注重对数据呈现模式的解释, 这一点更符合实证学科的特点。

第五, 跨学科性不断提高, 专业性学科交叉深入, 建立跨学科研究团队势在必行。翻译学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应用, 使其跨学科性进一步凸显。实证翻译研究无论是对翻译过程、产品还是功能的考察, 都会涉及数种专业方法的综合运用。实验心理学方法、计算机辅助技术、认知科学、医学及神经科学方法的交叉运用, 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研究者必须完全掌握其它领域的知识与技术, 但其它领域研究方法在翻译学上的应用, 可以为翻译研究者打开思路, 更好地观察翻译现象或行为, 认识翻译的本质。

5. 结语

翻译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经过近四十年发展, 从关注翻译产品到探索翻译过程, 从规定性研究到描写性研究, 从认知模式到语料库模式, 发展到了实证翻译研究模式。实证翻译研究模式同样是对先前各类研究模式的整合与发展,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只是实证翻译研究发展的一个课题, 基于各类语料库对产品及功能的实证描写研究, 进一步完善了翻译学作为实证学科的本质。新时期, 在原有翻译过程研究模式和语料库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基础上, 计算机技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翻译学的融通将会促进实证翻译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 再次将翻译学带入一个崭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 Angelone, E. The impact of process protocol self-analysis on errors in the translation product [C] // Ehrensberger-Dow M., Englund-Dimitrova, B., Hubscher-Davidson, S. & U. Norberg. *Describ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cts and even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5. 105 – 123.
- [2]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C] // Baker, M., Francis, G. & E. Tognini-Bonelli.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33 – 250.
- [3] 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J]. *Target*, 2000, 12(2): 241 – 266.
- [4] Borius, P., Giussani, C., Draper, L. & F. Roux. Sentence translation in proficient bilinguals — A direct electrostimulation brain mapping [J]. *Cortex*, 2012, (48): 614 – 622.
- [5] Börsch, S. Introspec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o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 // House,

- J. & S. Blum-Kulka.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195 – 209.
- [6] Callaway, E., Tueting, P. & S. H. Koslow.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in Man*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 [7] Carl, M., Bangalore, S. & M. Schaeffer.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C]. Heidelberg; Springer, 2016.
- [8] Carl, M. Translog-II: a program for recording user activity data for empir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 [C] //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 (ELRA), 2012.
- [9] Čulo, O., Hansen-Schirra, S. & J. Nitzke. Contrasting terminological variation in post-editing and human; translation of texts from the technical and medical domain [C] // Sutter, G. D., Lefer, M. & I. Delaere.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 Berlin; De Gruyter, 2017. 183 – 206.
- [10] Delaere, I. & G. D. Sutter. Variability of English loanword use in Belgian Dutch translations;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source language and register [C] // Sutter, G. D., Lefer, M. & I. Delaere.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 Berlin; De Gruyter, 2017. 81 – 112.
- [11] Ericsson, K. A., Charness, N., Feltovich, P. J. & R. R. Hoffma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Ferraresi, A. & M. Miličević. Phraseological patterns i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imilar or different? [C] // Sutter, G. D., Lefer, M. & I. Delaere.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 Berlin; De Gruyter, 2017. 157 – 182.
- [13] García, A. M., Mikulan, E. & A. Ibáñez. A neuroscientific toolki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 // Martín, R. M. *Reembedding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21 – 46.
- [14] Hansen, G.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Process and Product* [C] // Frederiksberg; Samfundslitteratur, 2002.
- [15] Hansen, 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s object of research // Carmen, M. & F. Bartrin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88 – 101.
- [16] Hervais-Adelman, A., Moser-Mercer, B., Michel, C. M. & N. Golestani. fMRI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reveals the neural basis of extreme language control [J]. *Cerebral Cortex*, 2015, (25); 4727 – 4739.
- [17] 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 Toury, G.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 New Delhi; Bahri Publications, 1987 [1972]. 10 – 25.
- [18] Hyönä, J., Tammola, J. & A. Alaja. Pupil dilation as a measure of processing load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language task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95, 48 (3); 598 – 612.
- [19] Janyan, A., Popivanov, I. & E. Andonova. Evoked gamma-band oscillations in single-word translation [R]. Poster presented at “Brain Talk: Discourse with and in the Brain”, the first conference in Linguistics within the Birgit Rausing Language Program. Lund University, Sweden, 2 – 3 June, 2008. (http://konferens.ht.lu.se/fileadmin/user_upload/conference/BrainTalk/JanyanPopivanov.pdf accessed 2018 – 1 – 6).
- [20] Ji, M. *Exploratory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üdenscheid; RAM-Verlag, 2013.
- [21] Ji, M.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Explored* [C]. Sheffield;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16.
- [22] Ji, M., Hareide, L., Li, D. & M. Oakes. *Corpus Methodologies Explained;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Routledge, 2017.

- [23] Klein, D., Milner, B., Zatorre, R., Meyer, E. & A. C. Evans. The neural substrates underlying word generation: A bilingual functional-imaging study [C]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5, 92 (7): 2899 – 2903.
- [24] Kussmaul, P. & S. Tirkkonen-Condit. Think-aloud protocol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1995, 8(1): 177 – 199.
- [25] Laviosa, S., Pagano, A., Kemppanen, H. & M. Ji. *Text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C].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 [26] Lehtonen, M. H., Laine, M., Niemi, J., Thomsen, T., Vorobyev, V. A. & K. Hugdahl. Brain correlates of sentence translation in Finnish Norwegian bilinguals[J]. *Neuroreport*, 2005, 16(6): 607 – 610.
- [27] Neunzig, W. Empirical studies in translation: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2011, 24(2): 15 – 39.
- [28] Price, C. J., D. W. Green & R. v. Studnitz. A functional imaging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switching [J]. *Brain*, 1999, 122: 2221 – 35.
- [29] Raney, G. E. & K. Rayner.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ye movements, and reading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3, 4(5): 283 – 286.
- [30] Rinne, J. O., Tommola, J., Laine, M., Krause, B. J., Schmidt, D., et al. The translating brain: cerebral activation patterns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J]. *Neuroscience Letters*, 2000, 294: 85 – 88.
- [31] Setton, R.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IS): Overview and prospects [C] // Kruger A., Wallmarch, K. & J. Munday.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11. 33 – 75.
- [32] Sutter, G. D., Lefer, M. & I. Delaere.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C]. Berlin: De Gruyter, 2017.
- [33] Tavakoli, H. *A Dictionary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Z]. Tehran: Rahnama Press, 2012.
- [34] Tymoczko, M. The neuroscience of translation[J]. *Target*, 2012, 24(1): 83 – 102.
- [35] 曹佩升, 刘绍龙. 翻译实证研究方法体系建构[J]. 甘肃社会科学, 2011, (1): 252 – 255.
- [36] 邓志辉. 认知学科视域下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发展评述[J]. 外国语, 2012, 35(4): 88 – 94.
- [37] 姜秋霞, 杨平. 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J]. 中国翻译, 2005, 26(1): 23 – 28.
- [38] 李德超.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05, 26(1): 29 – 34.
- [39] 苗菊, 刘艳春. 翻译实证研究——理论、方法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0, 7(6): 92 – 97.
- [40] 苗菊. 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 – 2006)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6): 45 – 48.
- [41] 王娟. 国外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眼动跟踪方法述评[J]. 外语学刊, 2016, (4): 124 – 129.
- [42] 王少爽. 西方学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体系[J]. 东北大学学报, 2012, 14(5): 455 – 460.
- [43] 魏景汉, 罗跃嘉. 事件相关电位原理与技术[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毛泽东著作英译中外对比研究”(15BYY035)

收稿日期: 2018 – 08 – 24

作者简介: 黄立波(1976 –), 男, 陕西宝鸡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西安外国语大学语言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 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